

※「重讀五四」專輯※

人與非人——重讀《新青年》

楊貞德*

五四時期的思想界，中西古今說法並出，但也隨著時間的遞移、時勢的變化和主義的實驗，逐漸顯現出統合的趨勢，乃至於宛如從多元走向了一元¹。實則，從歷史後見之明看來，五四思潮的複雜性難以一言以蔽之。學界曾經從特定的視角，提出整體主義式反傳統的意識形態、救亡壓倒啟蒙的選擇、融合一己與集體的個人主義²，以及其他等等提綱挈領的解析。這些解析的作用不在涵蓋所有的事例或細節，而在提供具體且具有理論性的線索，資以檢視個別人物的選擇，與宏觀理解五四之為重大歷史事件的意義。本文同樣就特定視角觀察五四思潮，惟將另從關注人之為多的立場，再探既反映五四且影響五四的《新青年》雜誌(1915-1927)³。

人類群居生活中最為明顯的現象之一，就是人的分類。人為何物，應該視之為一（單數），強調彼此的共同性、同質性、普世性；還是視之為多（複數），強調彼此的獨特性、歧異性、多元性？無論是主張其為一或為多，都各有其作用和局限。不同文明、不同思想家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曾分就知識、倫理、社會、經濟

* 楊貞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¹ 例如，就政治思想而言，時人對於其中從文化轉向政治的取向，或者反對，視之為踏上了歧路；或者肯定，以之為走上正確的道路。關於從不同立場理解五四的方式，參見歐陽哲生：〈被解釋的傳統〉，《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42-274。

² 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3-39；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時代的探索》（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頁129-139。

³ 《新青年》雜誌始於1915年9月15日發刊的《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新青年》，1921年之後斷續出刊，及至1926年7月停刊。本文所使用的版本為1988年上海書店合輯為12冊的影印本。

和文化等等層面，提出不同的答案。及至近代，對於自由、民主、多元和認同政治的肯定，與世界村的日益成形，人如何分類與因之而來的人之為一或為多，尤其成為個人切身的問題。我具有那些與其他人相同的特徵？是否有所謂共同的人性？我如何被視為獨立自主的個人？如何或是否需要與他人結合為群體，而被歸屬為特定的家族、種族、國民、階級或其他種種次級團體？如何不致於成為不具個別性的個體，甚或因而受害？又將如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個人或群體？凡此人的分類和團結問題，在現代世界中以不同形式在各地湧現，並帶來不同的結果。

本文所謂的「一」與「多」，主要借助於二十世紀政治理論家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與史柯拉 (Judith N. Shklar, 1928-1992) 兩人⁴。她們都著眼於人之為多，強調個人知識和生活的多元性——必須重視且肯定人與人的別異，認清政治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有其特定的處理原則，與區分作為人與作為公民的不同——並且致力於說明視人之為一或為多在政治上的重大意涵。鄂蘭區分政治與所謂社會問題（特別是無以滿足吃飯等生存要求的貧窮問題）。她在法國大革命中看見將社會問題視為政治問題——亦即：就人的共同生理現象，視人為同質且高大之「一」，並意圖以政治力滿足這一凡為人則無可免的需求——與由此衍生以人所共有之「同情」為由，訴諸暴力的做法。史柯拉不贊同鄂蘭在政治與社會問題之間的區隔，並且明白肯定道德感情在政治中的積極角色和複雜性，分殊作為人與作為公民之間不盡相同的道德要求⁵。下文即以閱讀這兩位理論家所獲得的啟發為線索，重讀《新青年》中看待「我」的方式與進入「世界」的嘗試。

⁴ 十分感謝本文審查人，指出原稿在這一部分的解說有所不足，並詳細地相與討論。鄂蘭和史柯拉都重視多元之人和政治自由，但有相當不同的具體主張；她們兩人的同與不同已經引起西方學界的注意，其中重點遠遠超乎本文所及。本文之所以援引她們兩人的看法，一方面在於彰顯有意識地探究人之為一或為多，這一議題的必要性和多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於例示《新青年》雜誌的內容極為豐富，而且與現代世界乃至於個人生活都息息相關，迄今仍有待吾人從不同政治論述／理論的角度，揭示其中猶未明白得見的意義。

⁵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1963]); Judith N. Shklar, *Ordinary Vi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相關討論，例見下列拙作所引書目：〈以殘酷為首惡——恐懼、自由主義與普世倫理〉，鄭宗義、林月惠編：《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哲學探索：劉述先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頁669-701；〈書評論文：從解放到自由的確立——引介鄂蘭《論革命》一書〉，《新亞學報》第36期（2019年8月），頁301-343。

《新青年》從作者各抒己見，經由「同人」階段，及至於分裂而成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的「同志」刊物，明顯展現出在思想和行動上從多元走向了一元。不僅如此，雜誌中明白可見多種對於人之為一或為多的思索。本文因此借用其中周作人（1885-1967）的用詞，以「人與非人」為題，重構《新青年》中國民／國民性、人／非人，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三項政治語言（論述），說明其中關於人之為一或為多的預設、理解，和強烈否定對立面的特徵。這三項政治語言在《新青年》各卷號中皆見線索；它們採用或相重疊、或相交錯、或相抵觸的語彙，儘管已經引起學界的討論⁶，其結構、內容和意涵仍值得再加細究。

如同下文所述，這三項分別以「國民」、「人」，與「階級」為核心的政治語言，各具觀察人之為「一」或為「多」的意義。舉例來說，它們都泯除文化的界線，從人與世界之為一的視野，借取西方歷史來反映和認識中國，從而開啟傳統中國不曾留意或重視的思想和生活面相，並或明或顯地指出更多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弔詭的是，它們同時也不同程度地窄化理解人類生活的視野，弱化、解除了論述中開發人之為多的可能性。若將這三項語言視為《新青年》前後不同時刻的重點所在，則就政治思想而言，它們從反求諸己，演成恆責於人，並且趨進於思想的整全化（認為同一原則或思想體系，適用於所有人和生活的各個層面，而並未強調政治原則可能不同於生活其他層面的要求），對立者的本質化（以為其人無法自我改變，而有賴外力的糾正），以及行動的激進、政治化（主張暴力行動，並以政治目標為首要）。此外，其中也顯示出，個人的吃飯／貧窮問題及其解決，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關注。這些特點反映出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自由之為政治自由、個人發展，與生存條件的滿足）、國家主義（國民之為現代國家的成員、有待改造的多數，與有待保障和引導的革命群眾）、社會主義（勞動之意義在於維持自身的生存、個性的發展，或改變世界的動能）、仇恨政治，以及近代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乃至於人類思想與歷史之間關係的重要面向。這些面向未必始於（或只見於）《新青年》雜誌，但從中得見相當清楚且豐富的內容和相關變化。

⁶ 例如，劉再復分別名之為「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人—個體」意識的覺醒，與「階級意識的覺醒與個體意識的消亡」。氏著：〈「五四」核心理念及其歷史語境——近現代三大意識的覺醒〉，《共鑒「五四」——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頁89-111。

一、「國民」與「國民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並未成功建立共和政治。陳獨秀(1879-1942)目睹革命後的亂象，於一九一五年創辦《青年雜誌》。發刊初期，作者各自表述，但都視青年為走向未來的希望，期許其人「以共和國民自居、以西洋文明自勵」。文章中雖然不無傳統的影響⁷，更為明顯的還是取近代西方為人類文明進化的體現和改變中國的模範，藉之解說進化和國民（及其背後的近代國家）理念，肯定個人的價值、開拓個人發展的方向，以及嚴厲批評傳統的思想與生活、反對中西的調和。

創刊號第一篇文章為陳獨秀所作〈敬告青年〉一文。文中鼓勵青年自期以「自主而非奴隸的」、「進步而非保守的」、「進取而非退隱的」、「世界而非鎖國的」、「實力而非虛文的」，以及「科學而非想像的」。陳獨秀這時認為社會上的陳腐朽敗分子，聽其天然淘汰可也。他將重心放在新鮮活潑之青年，並呼籲其人以內心為戰場，以正確和理想的人格理念，力排其中「陳腐朽敗者」。具體而言：

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⁸

陳獨秀所強調自我奮進的倫理取向，及其中今古、新舊、中西對立的反傳統色彩，在《青年雜誌》的文章中幾乎隨處可見。

如果說陳獨秀偏重說明青年在修身方面應有的智識，創刊號的第三篇文章——高一涵(1885-1968)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則顯得另專注於解說修身之於治國的意義，也就是：以共和為目標，說明青年如何經由自我改造，成為負責的國民。從吾人今日區分作為人與作為公民的角度看，高一涵的國民論述內涵若干保留這般區分的可能。他視國民為人的政治身分，面對的是共和政治的困境（而不是個人生活的全部），並且明白反對國家凌駕個人。只是，隨著討論的開展和其他作者的加入，《青年雜誌》所述「國民」一詞的內涵、國家的性質、作為對立面的中

⁷ 例如，創刊宣言如是表示：「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本誌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社告〉，《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頁1。

⁸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頁1。

國傳統，或者是面對傳統的解決方式，出現了有形、無形的變化。而高一涵針對政治領域發言的做法，很快也沒入時代中就個人人格針砭時局、世態的氛圍。

（一）「任重道遠」的共和國民

高一涵以〈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為名，在《青年雜誌》的第一卷第一、二、三號發表了三篇文章，分別說明共和國的言論自由、小己主義，與青年為了實現共和應有的準備。這些討論反映在革命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亂局中，堅持繼續向共和前進的立場，並透露出從當時輿論界探索國體形式的氛圍，轉往以解說國民立國精神及其養成為重點的趨向。

第一篇〈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召喚青年「自我作聖」（頁6），「脫胎換骨，滌盪其染於專制時代之餘毒」（頁1）。文中首先區分共和與專制；主張「共和國本建築於人民輿論之上」，輿論則以個人言論自由為基礎。高一涵說：

共和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則在國民之全體。……共和國之政治，每視人民之輿論為運施。⁹

高一涵深知輿論所言未必盡屬合理（頁7），進而指出：若要造成真正輿論，只有「本獨立者之自由意見，發揮討論，以感召同情者之聲應氣求」（頁7-8），並針對「國民」應有的德知，解說形成真正輿論的方式。根據他的解說，青年若要承擔共和之責，根本之途在於道德；道德意指：本於天性、自然的自由發展，而非西方所謂本於神，或東方所謂本於「先王之道」及其背後的「天」；自然則意謂「隨其秉賦之奇，施以修繕之力」，而不是無所改變的「最初最稚」（頁4）；至於自由的發展，則特指個人獨立——而非多數、亦非少數——的意見。高一涵相當重視人有別於物¹⁰，並循以指出：

〔人〕有獨立之才力心思，具自主自用之能力。……人之所以為人，即恃此自主自用之資格。惟具有此資格也，故能發表獨立之意見。此人品之第一義也，亦即輿論正當之源泉。……欲造成真正輿論，惟有本獨立者之自由意

⁹ 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頁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¹⁰ 另如：人有別於禽獸（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1915年10月〕，頁4），人為萬物之靈說（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頁3）。

見，發揮討論，以感召同情者之聲應氣求。(頁 6-7)

高一涵相信：若是青年以獨立的意見相呼，則「必有他人以獨立之見相應不已」，而輿論成焉(頁 6)，「國民總意」成焉(頁 1)¹¹。不過，個人的獨立意見何以或如何讓人相應不已？高一涵並未多做解說。

高一涵文中的重點，另在如何保障個人的自由。他強調：天地間無所謂絕對的自由(頁 5)，獨立的意見不是單純地隨心所欲，共和精神所仰賴的是「平等的自由」。也就是說：

自由要義，首當自重其品格。所謂品格，即尊重嚴正，高潔其情，予人以凜然不可犯之威儀也。然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以尊重一己之心，推而施諸人人，以養成互相尊重自由權利之習慣。(頁 6)

據此，高一涵不但指出政府不能侵入他人之自由言論，更明白主張嚴禁「人民互相抹煞自由言論」，因為不尊重他人之言論自由權，也就失去一己言論自由的根據(頁 7)¹²。

高一涵的第二篇〈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文章，提及政府施政之效¹³，但主旨另在青年應取的「自利利他主義」，亦即：

應以謀社會之公益者，謀一己之私益。亦即以謀一己之私益者，謀社會之公益。二者循環，莫之或脫。損社會以利一己者固非，損一己以利社會者亦謬。(頁 1)

面對這般密切糾結又充滿張力的一己與社會關係，高一涵堅持小己為先。他承認小己主義「推其流極，不無弊害」，但還是希望借助其為文明日進的力量，並期之成為安固強盛國家的基礎(頁 3)。

循此思維，高一涵期許青年以國民自任，但拒絕且抨擊視國家為人生意義所在。他聲明國家是「人類創造物之一種」，旨在保護小己之自由權利，「俾得以自

¹¹ 高一涵在此用了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總意」說。他的國家觀結合西方多位思想家的意見，其中究竟有待梳理，本文不及。

¹² 那麼，要如何達成這一目的？高一涵除了自我要求之外，曾在不同的脈絡中討論了守法之於國民的重要，不過並未將兩者扣緊來談。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2 號(1915 年 10 月)，頁 3-4。

¹³ 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2 號(1915 年 10 月)，頁 1。下文凡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力發展其天性」(頁2)。他也藉此批評中國數千年文明，指其在上者以「偽國家主義」芻狗人民，人民則躲在「家族主義」下逃避，終致國家、社會、小己「交受其害，一至於此」(頁3)。高一涵另且明白反對「犧牲主義」和「慈惠主義」。在他看來，犧牲有時能「振起頹廢之習俗，激發腐壞之人心」，但並非共和之道。高一涵說：

共和國家，乃合人人之利益以成社會之利益者。……設損一己之利益，以利他人，則一己之利益既喪，即社會利益之一部，缺而不完，而所謂利他人者，未必即能為他人之利。(頁4)

在慈惠主義部分，高一涵指出：要保全人之人格，必要求其人以勤勞所得「自遂其生」。他甚至於表示：若是以慈惠為仁為善而行，恰顯得受惠者之必為不仁不善(頁5)。

(二)「國民性」與「青年之敵」

《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二號，重點在於解說青年身為共和國民，應有的價值取向與自我改造。例如，高一涵表示：

習俗浸潤，浹髓淪肌，法令教育一時皆難以收效。非人人自悟其非，而以明於中者行於外。(頁6)

相較之下，雜誌第三號及其後的討論，則隱然指向積極向外行動的方式，既引介歐美各國的青年論述與組織(例如，第一卷第三號的中國一青年譯：〈青年論〉；謝鴻：〈德國青年團〉)，也敲起了低沉的戰鼓。在這些論述中，「國民」一詞的重點，已從共和政治中應有的「國民」，轉化為現實中思以救國的「國民」，或者是需要有所改變的「吾民」、「國人」、「民眾」；與青年新知相對立的舊習俗、舊說，則或者以「國民性」表述，或者以傳統學說、政治、社會與家庭中的不同事例為證。

《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三號所見陳獨秀的〈抵抗力〉一文，清楚顯現出變化的跡象。首先是戰鬥的氣息。陳獨秀先前已就「生存競爭，勢所不免」¹⁴，敬告青年應進取而非退隱，而今則進一步談抵抗力，意謂：

萬物各執著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與天道自然相戰之謂也。……

¹⁴ 陳獨秀：〈敬告青年〉，頁3。

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¹⁵

據此，陳獨秀宣言：人生「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頁2）；「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豪傑之士只要一息尚存，就沒有逃遁的餘地（頁5）。

二則是國民的意義。《青年雜誌》的作者都認為，青年所需的新知與中國傳統大相徑庭，陳獨秀尤其傾向於以全稱性語詞表述來自傳統的壓力¹⁶。他在〈抵抗力〉文中且運用時論所見「國民性」一詞，標誌中國傳統所形成之後果，從而使得「國民」一詞有了不同的意義。面對日本雜誌批評中國「一般國民」屈從於強勢，陳獨秀先是喟嘆此說何能忍、何能「強顏不承」，繼而聲稱：抵抗力之薄弱是中國衰亡「最深最大之病根」（頁2-3），也正是國民性的根源。他說：

吾國社會惡潮流勢力之偉大，與夫個人抵抗此惡潮流勢力之薄弱，相習成風，廉恥道喪，正義消亡，乃以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憊、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頁4）

顯然，「國民」這時意謂的已經不是高一涵筆下共和國應有的「國民」，而是現實中的國人。同時，高一涵的第三篇〈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也顯示出類似的變化。文中表明今日變局不只是國體問題，還是國家存亡的關鍵，之後即專注於解說，青年在建立共和國家之前應有的「練志」、「練膽」和「練識」三項自覺之道¹⁷。

一九一六年，辛亥革命老將高語罕(1887-1948)開始為《青年雜誌》撰文，不僅強化了陳獨秀等人語彙上的變化，還帶來不盡相同的聲音。一者，高語罕在批

¹⁵ 陳獨秀：〈抵抗力〉，《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頁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¹⁶ 例如，〈敬告青年〉文中即表示：「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頁3）；〈抵抗力〉文中將「舉凡吾之歷史、吾之政治、吾之社會、吾之家庭，無一非暗雲所籠罩」，都視為除舊布新的對象（頁3）。一九一六年初，陳獨秀更提出以一九一六年為中國歷史分段，之前種種為古代史，當至一九一六死，以後種種則將自一九一六生。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年1月），頁2。另例見汪叔潛之聲稱：新舊不能相容更甚於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汪叔潛：〈新舊問題〉，《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頁4。

¹⁷ 高一涵在討論「練志」時，且顯得認可犧牲時而有其必要。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頁5。

判傳統家族、教育和社會時，採用的語詞更具戰鬥性。他先以「青年之障礙」為小標題，指責中國家族社會「阻礙」青年前途，主張「知其障礙而去之」¹⁸；稍後且以「青年之敵」為題撰文，表明青年所須面對的傳統，不只是消極的阻礙，還是積極的敵人。二者，高語罕在不同的文章中援引莊子、陳白沙(1428-1500)、王陽明(1472-1529)和其他中國歷史人物的說法，但並未因此對於傳統有不同的態度；他激烈地批判傳統，也強調青年之自覺、自克乃是解決問題的前提。〈青年之敵〉一文以「豬性」形容「吾民」¹⁹，以「惰性」為其醞釀媒孽，也是汨沒良知良能的內界之敵。換言之：

惰性者，吾國人之公毒也，即吾國人之公敵也。吾人為此敵所降伏，既遠且溥。賢而至於聖哲，愚而至於編氓，上而至於元首，下而至於娼優，其思想、其言論、其舉動，莫不受惰性所鞭笞。(頁3)

高語罕堅信，不克此內界之敵，無法倖免外界之敵——鄰國之欺凌、神奸之蠹國，與惡社會、惡風俗、惡國家所留下之舊思想等等——的包圍和降戮(頁4)。

三者，高語罕在討論國民的責任時，結合了陳獨秀和高一涵的說法，指出國家的強盛固然在於少數優秀分子，立國要素尤在多數國民的普通智識，應予加強(頁6)。更重要地，他從競爭和演化的角度，提出了有別於前述高一涵小己主義的國家觀。高語罕說：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足則爭。爭則強弱以分，弱者肉而強者食。知識漸起，盡於危亡，用相結合以為保助。於是由游牧而酋長，由酋長而國家。國家也，又有由專制而立憲，由君主而民主者矣。要之立之政府。託以國權，奉身公僕，出納民意。冀以內息紛爭，外禦鄰敵則一。²⁰

以此為前提，高語罕將國家的目的，解釋為「謀一國最大幸福，謀公共安寧」(〈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頁5)。至此，《青年雜誌》上明顯得見兩種不同的國家觀。高一涵強調個人自由的優先，雖然他所持人能彼此相呼應之說，也預設了某種程度的人之為一。高語罕則更為重視個人的安全與幸福，明顯關注人的同質性，並明白援引歷史演化階段論。這兩種國家觀在日後《新青年》雜誌中將占有不同的分量，並

¹⁸ 高語罕：〈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年1月)，頁1、7。

¹⁹ 高語罕：〈青年之敵〉，《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頁2。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²⁰ 高語罕：〈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頁5。

且展現出不同的重大現實意涵。

(三)「新青年」

一九一六年九月，《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一號改名《新青年》出版。其中特徵之一，在於深化「生理」相關問題的討論。陳獨秀在本卷卷首〈新青年〉文中，指出雖然年齡同為青年，卻有新舊、真偽之別，兩者在生理和心理上「固有絕對之鴻溝」²¹。這般在青年中進一步分殊的做法，仍然以傳統和受到傳統浸潤的自我，作為主要的對立面。不過，相關討論已經有些變化。

「青年」一詞本從生理考量，陳獨秀前此在〈敬告青年〉文中，即以新細胞為比擬，以「新鮮活潑」描述青年²²。這時，他對青年另期以「壯健活潑」，指責有人雖然正值青年，身體卻已入「頭童齒豁之期」（頁1）²³，並就新青年的心理特質，明言：留著「齷齪思想」些微於頭腦，「則新青年之資格喪失無餘」（頁3）。陳獨秀所列出的心理特質，包含拋棄做官發財的卑劣思維，與明白人生歸宿在於內圖個性發展，外圖貢獻其群。後者的價值取向，明顯呼應高語罕先前所述國家觀，與其中對於「幸福」的肯定。陳獨秀表示：

幸福之為物，既必準快樂與痛苦以為度，又必兼個人與社會以為量。……吾青年之於人生幸福問題應有五種觀念。一曰，畢生幸福悉於青年時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內容以強健之身體、正當之職業、稱實之名譽為最要……。三曰，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四曰，自身幸福應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賴他人。五曰，不以現在暫時之幸福，易將來永久之痛苦。（頁3）

也就是說，相較於高一涵的小己主義，陳獨秀在主張兼顧個人與社會幸福的同時，顯得更為著重社會和未來。當然，陳獨秀這一「新青年」論述仍然有其個人性和開放性；他深信所有青年都可以經由自覺、自力成為新青年。

緊接著〈新青年〉一文，李大釗(1889-1927)再加發揮陳獨秀對於生理、青年和群體的關注。他取青年「獨享」的「青春」為題，以青春的進程和無盡，描繪空

²¹ 陳獨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頁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²² 陳獨秀：〈敬告青年〉，頁1。

²³ 《新青年》中對於生理的關注，也明顯見於繼起對於衛生、體育、早婚，乃至於人種改良問題的關注。本文不及。

間無限、時間無極之天地宇宙的變與不變，並期許青年以有盡的生命，創造無盡的意義。用他的話說，亦即：

生死、盛衰、陰陽、否泰、剝復、屈信、消長、盈虛、吉凶、禍福、青春白首、健壯頹老之輪迴反復、連續流轉，無非青春之進程。而此無初、無終、無限、無極、無方、無體之機軸，亦即無盡之青春也。……〔青年銳進之子〕以宇宙之生涯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為自我之青春。宇宙無盡，即青春無盡，即自我無盡。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氣魄，即慷慨悲壯、拔山蓋世之氣魄也。惟真知愛青春者，乃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惟真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種精神與氣魄。惟真有此種精神與氣魄者，乃能永享宇宙無盡之青春。²⁴（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李大釗筆下，青年有涯的個人生命，將得以藉由把握現在——「青春之我」、「吾人青春中之青春」——的「今日主義」，創建青春之家庭、國家、民族、人類地球和宇宙（頁 12）。他召喚青年自我改造：

青年之自覺，一在衝決過去歷史之網〔原文如此〕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殭尸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吾願吾親愛之青年，生於青春，死於青春，生於少年，死於少年也。（頁 11；底線為筆者另加）

就此，李大釗重新界說青年生命的意義；其中所欲維護者仍是大於個人之集體，但秉持的已是積極的破壞。不僅如此，個人在犧牲和死亡中體現生命意義的說法，也全然不同於高一涵的小己主義。

《新青年》在因應輿論的變化和討論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另也開始點名批判。一九一六年九月，康有為（1858-1927）由於政府改訂祭孔禮儀，發〈致黎元洪、段祺瑞書〉，重申孔教不當拋棄，並指出「大教典禮，非議院所及，非有司所得專」²⁵。陳獨秀為此相繼作文批評。他雖然表明康有為的看法是個人之事，卻也直接指名，有〈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之作，且在〈孔子

²⁴ 李大釗：〈青春〉，《新青年》第 2 卷第 1 號（1916 年 9 月），頁 3。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²⁵ 康有為：〈致黎元洪、段祺瑞書〉，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0 集，頁 313。

之道與現代生活》中表示：

不圖當日所謂離經畔道之名教罪人康有為，今亦變而與夫未開化時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²⁶

陳獨秀的做法使得青年的對立面，從比較抽象的傳統（如：專制、家族主義、惰性等等），落實在具體的個人身上。新與舊的對抗，也隨著以康有為（特定人物）為標誌，隨著對於他的不同認識和評價，更為白熱化，增加更多想像的空間。

不過，陳獨秀對於康有為的評論，這時另有一重要的意義，亦即：整全性論述的完成。康有為在前列信中提出政教之間應該有所界分。陳獨秀的回應也曾分就政治和日常生活提問：孔門修身倫理學說是否可與共和立憲政體相容？儒家禮教是否可以施行於今世國民之日常生活²⁷？不過，陳獨秀的答案將兩者合併，強調孔子之道過去「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今日在兩方面都不適用。他更主張青年的人格獨立等等現代特質，同屬現代生活中政治、倫理、經濟等層面的要求（頁3-4、5-6）。

二、人與「非人」

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五和第六號，分別刊出胡適（1891-1962）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點燃了一場影響廣闊且深遠的戰火。文學革命的主張如同前列國民論述般，關注中國的命運，運用進化的語言，批評中國國民性，並強調個人自覺、自省的改革方式。不過，其中出現更為激進的語言和指向，明白彰顯人之為一或為多之間的糾結，與自由和科學之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信念。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謙稱「容有矯枉過正之處」，希望讀者有以匡正²⁸。陳獨秀見此宣示：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

²⁶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年12月），頁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²⁷ 陳獨秀：〈再論孔教問題〉，《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頁2。

²⁸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頁11。

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²⁹

胡適因而再度投書，重申「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³⁰。陳獨秀承認胡適所言乃「學術發達之原則」，但堅持這不適用於文學革命。他宣稱：反對白話文學就如同清初排斥西法、非難地球繞日，「吾輩實無閒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³¹！這時，周作人也以猶如二元對立的語氣，解說新文學的內容。他表示：

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³²

自此而後，革命成為《新青年》中常見的語詞。

如同下文所述，文學革命不僅用詞激烈，而且實際擴大新舊對峙的戰場，改變所謂敵人的性質。其中「人」的論述，強調人之所以為人，並且有意識地以普世的「人」為對象，肯定其共有之生物和精神需求。相關討論明顯跨出政治視域，面對個人的生活處境，也面對現實中所有——而不只是有志於修身治國——的人發言。相關討論和創作，具體指明青年和女子在家庭裏所遭逢的痛苦和困境，以及個人面對社會多數意見的無力，從而突顯個人環顧身旁即可得見的難局。其中，就中國語文和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討論人類文明進化的性質與過程的做法，更使得所謂進化和革命成為所有讀書人開卷或作文都須面臨的抉擇。尤其重要的是，這些生活中的文化與社會問題，同樣見諸近代西方社會，所涉及的已經不只是中西文化別異而已。

（一）人與非人的文學

胡適文學革命論的基礎在於所謂「歷史的文學觀念」³³。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即已指出：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³⁴

²⁹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頁1。

³⁰ 胡適：〈通信：寄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頁4。

³¹ 陳獨秀：〈通信：答書〉，《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頁6。

³²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頁575。

³³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頁1-3。

³⁴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頁2-3。

只是，胡適在說明中國文學史上本有其變化趨勢、經歷過多次革命的同時，也以一種近乎目的論的說詞，強調白話文學體現歷史進化「更自然更自由」的走向，既是好的文學工具，也創造出好的文學內容。何謂好的文學？胡適以演化論為基礎，主張寫實主義，——以文學為人類生活狀態的記載，生活隨著時代變遷，文學也隨著時代變遷——進而呼籲今人創造今人的文學，「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³⁵。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發刊〈人的文學〉一文，更明確地解說實寫社會的意義³⁶。文中指出：「人的文學」意指從文學開始，提倡人道主義思想，並以人道主義為本，記錄、研究人生種種問題（頁 578）。周作人特別聲明：

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頁 578）

周作人在此採用類似胡適文學演化論的說法，意謂各個時代各具特色，人類歷史逐步向著實現人道前進。不同的是，胡適在理論上側重於文學與時俱進的原則和因之而有的變化，周作人則明言其背後有著特定而絕對的目標。

周作人聲稱：人道有是非、無新舊，只因人的理解有其限制，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用他的話說，亦即：

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無奈世人無知，偏不肯體人類的意志，走這正路，卻迷入獸道鬼道裏去，旁皇了多年，纔得出來。（頁 575）

相應於強調人道的絕對性，周作人主張破除中外界線，並有意識地運用人之為一或多的言詞。他表示：

地理上歷史上，原有種種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氣流通也快了，人類可望逐漸接近，同一時代的人，便可相並存在。單位是個我，總數是個人，不必自以為與眾不同，道德第一，劃出許多畛域。（頁 583；底線為筆者另加）

在周作人看來，人已一體；人同具感覺性情，他人以為苦，我必以為苦；人的運命同一，能降在他人身上的苦，未必不能降在我身上，要顧慮我的命運，便「同時須顧慮人類共同的命運」，「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頁 583、584）。就理論

³⁵ 同前註，頁 4。胡適日後表明：文學革命的內容往往受個人嗜好和時代潮流的影響。見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 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年），頁 30。

³⁶ 胡適日後稱譽周作人〈人的文學〉一文是文學革命時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人的文學」一詞標誌出革新文學內容的目的。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 導言〉，頁 29。

上看，如周作人般抱定一個「人」字，視此外分別都是虛偽的說法，一方面能夠用以對抗現實中的壓迫和不平等³⁷，另一方面卻也意涵解消人之為多、各自相異、各有不同道德要求的可能性！毫無疑問，周作人這時意在前者，試圖以強調人之為一，為個人的解放和幸福立論。

首先，周作人對於人的界定染著濃厚的反傳統色彩，旨在追求個人的解放。他以近代西方為發現真理的先行者（頁 575），並從演化的視角，意有所指地表示：

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按：亦即中國傳統常見〕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顛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頁 576）

根據周作人的解說，人具有與動物相近的「肉」和與動物相遠的「靈」。前者意指如同動物的生活本能，其為美、善，應該獲得完全的滿足。也就是說，實際上不可能有所謂無我、純粹利他的愛（頁 578）。儘管如此，人終究比其他動物進化，是以不會也不能耽溺於肉的滿足，而要朝向「靈」的一面提升，追求「複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改造生活，使其內面達到「高上和平的境地」（頁 576）。

再者，周作人所提出的人與非人之辨，旨在作為形容詞，或者描述個別作者的取向，或者指稱非人的文學和非人的生活。他以中西文學著作為例，指出其中人與非人的區分出於作者的決定，「就祇在著作的態度不同」：

一個嚴肅，一個遊戲。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對於非人的生活，懷著悲哀或憤怒。一個安於非人的生活，所以對於非人的生活，感著滿足，又多帶著玩弄與挑發的形迹。（頁 579）

更具體地，周作人表示：中國文學中極少人的文學，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非人的文學則有淫書與鬼神、神仙、妖怪、奴隸、強盜、才子佳人、下等諧謔、黑幕等等各類書冊——包含《西遊記》和《水滸傳》——以及結合這些思想的舊戲。它們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和平，即使有些部分具有研究民族心理和文藝批評的意義，「在主義上一切都該排斥」。值得稍加留意的是，周作人文中儘管堅持「不能與相反的意見通融讓步」，卻也表明對於古今人物，不能單依一己成見「排頭罵倒」，而要「認定他們的時代，給他一個正直的評價，相應的位置」（頁 580-583）。

³⁷ 周作人：〈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新青年》第 4 卷第 5 號（1918 年 5 月），頁 426。

(二)「國民之敵」

文學革命中人的論述如同前列國民論述般，以主張獨立、自由的個人為標誌，以批判中國傳統為要務。不過，其中透露的訊息已經更為豐富。舉例來說，文學革命所倡導的寫實主義，帶有深刻介入社會的意涵。胡適、陳獨秀等等站在先鋒位置的旗手，篤信好的文學正是促成良好世界的利器，除了嘗試和鼓勵創作好的文學之外，且以翻譯外國文學為改變中國文學的重要道路。這些翻譯文學對於現實的批判，透露出：中國問題未必單純源於中國傳統，而是反映出人類共同生活的難局；青年在變化自己和社會、國家之時，所需面對的阻力已經不是所謂的中國國民性而已。

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定名為「易卜生號」，介紹挪威劇作家易卜生 (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 及其著作。其中有胡適〈易卜生主義〉一文，說明易卜生如何讓大家看清世間、社會的腐敗齷齪：他書寫家庭成員的自私自利、倚賴他人、假道德和怯懦膽小；指責法律的僵化，宗教的儀式化、虛偽和功利取向，與道德上男盜女娼其內的自欺欺人³⁸。尤其重要地，胡適列出易卜生「極顯而易見的學說」，亦即：

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 (individuality)，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頁 497)

這一段話隱然指出，原來被視為理想的西方社會也是問題重重，不僅家庭、法律、宗教、道德等等維繫社會的機制不可信賴，個人與社會之間更顯然是場結構性的永恆對峙。《新青年》同時且連載易卜生的劇作《國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其中，為了捍衛真理而敢於堅持己見的斯鐸曼醫生，在公民會議上經全體一致表決為「國民的公敵」(胡適的譯名)，會後且遭到地方上所有人的排擠和威脅³⁹。這時，國民的意義已經不只是中國之為現代國家的成員，或者現實中的國人，還是人類社會構成中有別於(甚至迫害)說明真相之異議者的眾人或多數。

³⁸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³⁹ 易卜生著，陶履恭譯：《國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頁93-117；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頁54-67；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頁60-72；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頁64-79；第5卷第4號(1918年10月)，頁80-96。

不過，胡適並未因此放棄對西方的肯定與對人的希望。他將易卜生比擬成醫生把脈，前提在於承認自己的缺失：

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頁 490）

胡適且指出：易卜生把脈的特徵在於不開藥方——因為人類社會極為複雜，沒有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要由病人各自去尋如何醫治（頁 502）——在於只提出「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作為保健良法（頁 506）。胡適如此引述易卜生：

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頁 502-503）

易卜生認為，多救出一人便是多準備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他深信這種為我主義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社會國家的健康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頁 504、506）。

同樣地，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也呼籲個人從救己、利己做起；講人道、愛人類，必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經營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周作人分從功利和情感兩個角度，解說箇中原由。一是，個人與人類有如樹木與森林；森林繁盛，各樹也都茂盛；然而森林的繁盛，又「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二是，個人愛人類，只為「己亦在人中」，「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頁 578）。

如果說前列「國民」論述中的理想青年宛如能夠改變現狀的積極力量，「人」的論述中所肯定的個人，顯得更接近缺之不可、有之不必成的消極條件。胡適鼓勵青年關注社會，反對獨善其身的自了漢，並引述「國民之敵」斯鐸曼醫生說，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然而，斯鐸曼醫生堅持真理，具有不為利益和勢力所脅迫的勇氣，卻仍無力說服現實中的公民會議。胡適看見斯鐸曼醫生的無奈，並指出：易卜生的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與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般的人物（頁 505）。問題是，容忍本來就不容易；如果社會本質上是個壓迫個人的機制，期望它反過來容忍個人更是緣木求魚。

胡適歷來相信輿論有其作用，這時只是如同高一涵稍早所表示：針對現實問題

的言論，能引人注意、使人覺悟⁴⁰。相較之下，周作人在思索梁漱溟(1893-1988)和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的言論難有具體成效時，更明白且直接地回應以言論改良社會的困難，並提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必要。他說：

雖然力量不及，成效難期，也不可不說，不可不做。現在無用，也可播個將來的種子；即使播在石路上，種子不出時，也可聊破當時的沉悶。使人在冰冷的孤獨生活中，感到一絲的溫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⁴¹

同為《新青年》作者的魯迅(周樹人, 1881-1936)，更以小說《狂人日記》中狂人最後恢復正常，表述試圖改變社會的枉然。一九二二年，魯迅談及當時感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折服朋友之所謂希望的可有。他說：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⁴²

未幾，這些文學革命的旗手即就如何著手改變現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三) 我們的園地？

胡適和周作人堅持以個人自省、自覺等方式，改變現狀。這原是《新青年》大多數作者的基本立場；他們無意涉入現實政治，也不主張使用暴力。不過，由於時局的變動和不同西方思潮(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湧入，雜誌中不同的聲音日漸增多。李大釗等人開始發言支持或介紹俄國革命，一九一九年五月第六卷第五號之為「馬克思主義號」，皆可為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遊行後，《新青年》雜誌展現出高度對於政治的直接關注。相關討論以當下、現實的世界為脈絡，更多於昔日所評述的中國傳統專制或新興共和，擬採取的手段也添加了集體行動和直接改造世界的色彩，積極肯定政黨和政治力可能有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發布的〈本誌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得見幾項雜誌的重大改變。其一，關注一致而共同的行動。〈宣言〉明白宣布「全體社員的公同意見」，主張「民眾運動社會改造」，並且在指出政治並非

⁴⁰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頁9。

⁴¹ 周作人：〈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頁425。

⁴²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1981]年)，第1集，頁419。

萬能的情況下，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要求政黨眼中必須有全體社會的幸福⁴³。其二，延續且彰顯視人為一的取向，將中國問題視為人類共同問題的表現。只是，〈宣言〉的重點從個人與社會的對峙，擴展到現實政治和經濟：抨擊所謂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宣稱對於懷抱侵略主義和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頁3）。

其三，主張以科學為知識的依歸。〈宣言〉中表示「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以破除迷信妄想為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並強調以實驗精神作為面對不同意見的方式。〈宣言〉指出：

因為要實驗我們的主張，森嚴我們的壁壘，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但反對的方面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我們以前，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於決斷的態度。（頁4）

這一段話結合了胡適和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之初的說法，惟另以科學和實驗的大旗為後盾，透露出相信應將科學／實驗的方式用於生活不同層面的跡象。

其四，關注人的共同性，但仍著重個人發展的空間。〈宣言〉中有一新的特點，在於彰顯「勞動」這一議題，指出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若從勞動之為人類滿足個人生物性要求（生存）的角度觀察，則尊重勞動意味著重視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共同性，並且具有激進的社會和政治意涵⁴⁴。不過，〈宣言〉的重點不在此，也並未重申《新青年》自始即肯定的人當自食其力，而是從人各有其性的角度表示：

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頁2）

換句話說，這時對於勞動的關注，仍然還是依循周作人談靈肉的理路，著重於靈（精神），而非肉（物質）的層面。

繼〈宣言〉之後的《新青年》，繼續肯定《新青年》自始即標舉的個人自由、獨立思想和評判的精神。胡適表明：反對的聲音不但為《新青年》做免費的廣告，而且使作者們得到討論的益處，「使真理格外分明」⁴⁵。不過，比起過去，雜誌刊登了

⁴³ 〈本誌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頁1、3。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⁴⁴ 這般立場參見鄂蘭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分析。Arendt, *On Revolution*, chaps 2-3.

⁴⁵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頁9。

更多關於科學、實驗的討論，實際的社會調查，與實踐工讀互助團的檢討；明顯納入更多關於經濟、勞動、貧窮、戰爭等等物質性問題的考慮；也引入左傾的陳望道(1891-1977)、李漢俊(1890-1927)和其他人等，加入編輯和寫作。

舉例來說，《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陳獨秀在解說民主主義時，借用當時在華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說法，表示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⁴⁶。李大釗則以共產主義為線索，在下一號發表〈由經濟上解釋近代中國思想變動的原因〉⁴⁷。一九二〇年三月第七卷第四號定名為「人口問題號」。陳獨秀更在第五號中界定新文化運動為「人」的運動，並表示：這一運動影響至產業，要令勞動者覺悟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作同類的『人』看待」⁴⁸。接下來五月的第六號「勞動節紀念號」，蔡元培(1868-1940)在首頁題上「勞工神聖」四字。九月的第八卷第一號增闢「俄羅斯研究」專欄。十二月，陳獨秀為駁斥張東蓀(1886-1973)所述，要過人的生活，首先要不談主義，增加富力，指出：

只願增進物質文明，卻不講適當方法去分配物質文明使多數人都能享物質文明的幸福，結果物質文明還是歸少數人壟斷，多數人仍舊得不著人的生活；要用適當方法去分配物質文明使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⁴⁹

在這時的陳獨秀看來，人的生活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當前要務在使多數人得到狹義人的生活，也就是衣食住的充分享用。及至第九卷(1921-1922)，《新青年》上充滿了引介或維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雖然也刊登了〈杜威〔在華〕演講錄〉。

《新青年》作者和議題的多聲和多樣化，並未使得雜誌成為進一步交換不同意見的園地。相反地，凡此現象預示了雜誌即將出現的分裂。在胡適等人明白提出不同意見後，幾經討論與折衝，《新青年》回歸由已經擁抱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主導，之後陳獨秀又交給自俄歸國未幾的瞿秋白(1899-1935)⁵⁰。

⁴⁶ 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頁14。

⁴⁷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

⁴⁸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頁5。

⁴⁹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頁2。

⁵⁰ 相關經過，見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183-248。

三、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

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在停刊數月後，改為季刊，由瞿秋白主編。第一期名為「共產國際號」，明白標示雜誌成為中共的喉舌，旨在從理論上闡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正確性，及其用於中國的必要。卷首所發布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以下簡稱為〈新宣言〉）⁵¹，重新為新青年定位。文中開宗明義引述《浮士德》（*Faust*），歌頌個人的力量和追求自由的想望：

我將創造成整個兒的世界，
 又廣大，又簇新；請幾萬萬人
 終身同居住，免得橫受危害，
 祇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勞動……
 我終看得見奇偉的光輝內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時我才說：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廣延，且相繼！
 我所留的痕跡，必定
 幾千百年，永久也不磨滅。（頁1）

這段話看起來也適用於前列「國民」論述與「人」的論述。只是，根據〈新宣言〉的內容，這裏所述自由勞動、平民和世界中的「自由」二字，意涵從壓迫者的魔掌下解放，更多於《新青年》過去所強調的個人獨立、平等、發展和批評的精神。

相較於「國民」論述和「人」的論述，〈新宣言〉取「階級」理念，從更廣闊的全球性政治、社會和經濟連動的一體關係，觀察和解說中國當下的處境與應走的方向，期能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文化、人類生存的眼前危機。根據這一論述，中國問題不僅反映人類共同的難局，而且實為全球秩序和戰略中的一部分，其解決應遵循共產國際所得出的科學結論，與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攜手共同奮鬥。其目標並非眼前的西方國家，而是猶未體現的「共產大同」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之境。然而，這一更為廣闊的視野，雖然看見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歧異，並

⁵¹ 〈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頁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將採取更為有效、使世界變得更好的手段，卻也帶來更為狹隘的焦距，意圖以階級定義和消滅敵人，從而消弭現實中異質的他者。

約而言之，《新青年》這時自我定位為「中國革命的產兒」，「不期然而然成為中國真革命思想的先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頁 1-2）。其中階級論述比過去更為強調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和以革命行動改變外在世界的重要性。在此，科學的特質在於科學結論的全面性和絕對性，意指：以科學所意涵的普世性和人的共同性為前提，根據科學定律批判與改變現有的社會，謀求人之所以為人應有的福祉。具體行動的方式有二：一者，主張只有勞動者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並據以不斷找出敵人——先係根據政治和社會分析的概念，批判本即被列為敵對勢力的宗法社會、軍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再則針對原本或可能的同志堅壁清野，以語言暴力抨擊和撻伐其他的社會主義者、曾經或可能被視為戰友的胡適，以及新興的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等等。二者，推動帶有強烈排他性和暴力運用的政治革命，包含組織政黨、動員群眾、採取流血行動等等。這些做法一方面帶來了有力的行動，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所謂科學結論的權威性，不敵政治力量的權威性，使得科學實踐淪為權力鬥爭。影響所及，知識的權威往往遭到政治力打壓；解放人人的理想和努力，反而落為鞏固權力的口實，甚至以犧牲他者或弱小為代價。

（一）科學與共產革命

《新青年》季刊的特色之一在於主張共產革命，並堅持政治革命與科學不可分離；革命的要求是科學的結論，科學是革命成功的基礎。也就是說，階級論述係以科學的角度，把中國問題放在人類和世界（之為一）的歷史定律中理解，從而就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和動力，界定中國之為無產階級國家的性質與任務。這時，中國問題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不只是反映不同人類社會中所共有多數壓迫少數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經濟和政治中多數被少數迫害現象的一環。據此，階級論述除了再次肯定前列「國民」和「人」的論述中對於傳統的批判，且進而指出傳統在現代世界中的吊詭位置，亦即：

中國現時的舊社會……已落於世界資本主義的虎口，與世界無產階級同其命運。因此，中國黑暗反動的舊勢力，憑藉世界帝國主義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依賴世界資本主義而時時力謀妥協。（頁 2）

換言之，中國封建社會本為壓迫中國勞動平民的加害者，在資本主義擴張為帝國主

義下既成為直接受害者，又成為共謀者⁵²；中國的現況不僅是阻礙進步的力量，也佈下了革命的種子。

《新青年》這時自許「當為社會科學的雜誌」（頁3）。〈新宣言〉中的科學觀乍看之下相當接近胡適的立場。例如，篤信科學方法的普遍適用性，呼籲：

當嚴格的以科學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學以至於文學，作根本上考察，綜觀社會現象之公律，而求結論。（頁3；底線為筆者所加）

另如，追求真誠討論後所得出更為正確的結論；強調社會科學無國界；以解釋現實社會和解決現實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的目的。除此之外，指出中國可以不再勉強照著現成的模型來捏（頁5、4），也顯得呼應了胡適所說理論只是解決問題的參考⁵³。只是，仔細尋繹，〈新宣言〉關於共產國際和青年之為羅針的結論，卻也已經透露出其中科學觀與胡適的立場實是南轅北轍。

舉例來說，階級論述將社會科學的權威性推到極致，反而成為具有封閉性和政治性的意識形態。瞿秋白所重視的科學性，在於科學的結論及其普世性和強制性，而有別於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時所指出之青年應有「非想像的」特質、胡適於五四遊行前後所闡釋（也獲得陳獨秀認同）的實驗方法⁵⁴，或者李大釗於「問題與主義」辯論中所述馬克思主義的工具性⁵⁵。〈新宣言〉聲稱現代最先進的社會科學派別正是共產國際（頁6）。緊接其後，由瞿秋白所作的〈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一文，在在皆就人之為一的角度發言，強調人的歷史

⁵² 這一論述及其意涵，參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⁵³ 1919年五四遊行後，胡適針對輿論中主義滿天飛的情況，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並因而引發一場他與李大釗、藍公武(1887-1957)等人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辯論。辯論中涉及的問題包含：「主義」何物，有何功能與危險，是否有別於學理？何人具有解說主義的能力或正當性？個人如何在眾多的主義中取捨？社會是否需要一致的主義？如何面對和服膺所取的主義？凡此問題這時皆亟待思想界的釐清。胡適明白地將問題與主義並立而談，再加以眾人相繼而起的討論，形構成五四討論時局和自我定位的一套語言，影響極為深遠。以此次辯論為脈絡，將可更清楚看出胡適與瞿秋白所持科學觀的異同及其政治意涵。下文雖將觸及一二，卻仍有很大抉發的空間，此處不及。

⁵⁴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頁1-2。

⁵⁵ 瞿秋白明言，對於主義的選擇，不是策略，不是依照促成改變的效能而定，而是根據客觀的知識，根據「社會進化中之客觀的可能和必要而確定」。屈維它〔瞿秋白〕：〈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頁79。

有其共同的發展原則和階段。文中指出：

那有時間空間及物質的社會，既呈一統形式，則必有某包涵萬象的動律，必有其總原則，方能發現此因時因地而異的各階段。無產階級……必須得一總原則……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敷衍塗砌。⁵⁶（底線為筆者所加）

循此，所謂因時因地的不同，意味著線性進程的先後次序，更多於各時空下不同面貌的多樣性。也就是說：

無產階級，秉其集合組織之根性，能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深察世界社會中之動象，得有切於現實的總原則，以為進攻資產階級社會之方針，進而求發展生產力，——發展無產階級自身，亦即以整頓世界經濟的總規畫，——有此，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會，復興人類的文化。（〈黨綱〉，頁 17；底線為筆者所加）

從字面上看，瞿秋白再三強調的總原則、總規畫、總方針，恰如同胡適在解說問題與主義關係中，明白反對的包醫百病之「根本解決」。

未幾，曾被視為科學方法發言人的胡適，開始成為中共的箭垛。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新青年》第二期，刊出陳獨秀為年初思想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所作的序文，不僅高張科學能支配人生觀的立場，更點名在論戰中同屬科學派的胡適，指其對於歷史唯物論的保留，在此次辯論後「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⁵⁷。一九二四年八月《新青年》第三期，瞿秋白作〈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一文，從一九一九年胡適與李大釗等人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辯論談起，直接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聲稱：

實驗主義祇能承認一些實用的科學知識及方法，而不能承認科學的真理。⁵⁸

瞿秋白這時強調「有益」和「真實」的區別，指責實驗主義否認一切理論的確定價值，以追求利益為目的，有別於革命哲學之反映真實。根據他的說法，實驗主義以「多元的」宇宙觀為基礎，不承認絕對、客觀的現實，而認為一切真實只是為了思想的方便，一切正義只是為了行動的方便而設（頁 13-14）。相較之下，馬克思主

⁵⁶ 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新青年》（季刊）第 1 期（1923 年 6 月），頁 16。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簡稱〈黨綱〉並注出頁碼。

⁵⁷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新青年》（季刊）第 2 期（1923 年 12 月），頁 31。

⁵⁸ 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季刊）第 3 期（1924 年 8 月），頁 1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瞿秋白對於實驗主義的解說與胡適或者杜威的立場實有距離。惟其中涉及複雜的解析，本文不及。

義所注重的是科學的真理，篤信：

現實祇有一個，真理亦祇有一個。我的觀念及思想，當然是刻刻變的；然而這是因為客觀的現實世界在那裏刻刻的變。（頁 15）

無論瞿秋白對於胡適或者實驗主義本身的理解是否恰當，他的目的在於堅持變動的後面有一絕對的真理和現實：這一客觀現實有其發展的定律，而且已為馬克思主義所揭示。是而，瞿秋白表明：唯有依照馬克思主義來行動，人的努力才有積極的可能與必然的勝利（頁 15-16、13）。

（二）「血的革命」

《新青年》季刊以革命行動為優先。它首先批判的其實不是胡適，而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以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8) 為代表的改良派。在瞿秋白筆下，人皆為一己的利益所牽動，並在物質生活的推動下結合與分化；若從生產力的角度觀察，則可根據擁有生產工具與否，將人分為內部日趨同化、彼此必然衝突，而且最終要在爭取政權上一較高下的兩大階級。就世界各種現有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上鬥爭而言，今日更是必須採取行動的時刻：

世界的文化，——人類的生存，——因生產力的抑遏不舒，爆裂的衝突時時發現，已經處於非常之危險的地位。現有的制度不破，人類的文化決不可救。社會改造的機運，已經具備，而且非於世界的範圍內著手不行。（〈黨綱〉，頁 12；底線為筆者所加）

瞿秋白更宣稱，這場階級鬥爭絕無妥協的可能；為了打破現有的制度，奪得政權，只能倚靠暴力，不能倚賴和平進化。

瞿秋白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情況為例證（頁 14、15、19-23），並且指出：各階級有其「根性」，不會因為個人的良心或理想而改變（頁 12）。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具有掠奪和無政府的根性⁵⁹，不容許資產階級擅自讓步，否則將危及其自身的存在（〈黨綱〉，頁 12-14）。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有其根性，使其成為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這個力量根源於客觀的政治經濟趨勢，是推動革命與獲勝的關

⁵⁹ 所謂資產階級的根性，用瞿秋白的話說，亦即：「資產階級在私有制度中是主人，在發財自由主義之下是主動力，——互相競爭絕不顧社會共同生產之規劃，是他的根性。所以無論如何，他必發現經濟上的無政府傾向。資產階級內部絕對不能消彌矛盾衝突。因此而有他的無組織性的特徵。」（〈黨綱〉，頁 13）

鍵。瞿秋白如此說明：

〔無產階級〕在私有制度中是對象，在發財自由制度之下是受動者；機器生產之物質生活使他不得不有統籌全局團結組織之根性。……〔其形成雖或有久暫之別〕，然而經濟動象之趨向，始終日就匯集同化。（〈黨綱〉，頁 13）

換言之，「客觀的科學上的公律」不許資產階級不採取「強力的壓迫方法」，也就不許無產階級不用「強力的反抗方法」。鬥爭的最後目標，先在建立勞動者的獨裁政體，再進入社會主義經濟，終至於共產主義社會（〈黨綱〉，頁 15）。

瞿秋白的根性說，使得「階級」論述截然不同於先前的「國民」論述和「人」的論述。「國民」論述不懷疑個人能夠以一己之力自我改變，從而改變世界；「人」的論述對於個人的改變不無疑慮，但也並未徹底地絕望。在「階級」論述中，個人受制於客觀形勢，無法藉由個人的良心和理想相抗拒，但能夠以組織的力量，合集體之力徹底改變現狀。然而，如果革命是普世性的科學結論，瞿秋白這時面臨解說馬克思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的難題。舉例來說，無產階級既然受客觀力量所驅動，何以仍需新青年作為無產階級的羅針？新青年未必出自無產階級、無其根性，如何「不得不」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如果新青年的權威奠基於科學知識的把握，則社會科學研究是否能夠改變或修正共產國際已有的結論？社會科學家是否將在革命運動中占據重要的角色？瞿秋白這時已經觸及這些日後中共必須面對的問題，不過並未以之為主要的關注。他此刻的言說旨在解釋和維護共產國際作為權力中心的政治地位，奉之為科學結論的權威，並將不同地區的個別因素，歸為階段或策略的不同，而不是針對既有信條或結論進行反思、修正。

（三）人的分類

瞿秋白除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藉以鞏固共產國際作為權力中心的地位，與強化革命行動的組織性之外，另一重要任務在於不斷分化人群，積極找出並嚴厲攻訐所謂的敵人。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指出：

祇有根據於無產階級集產的可能性，經過社會主義有規畫的經濟制度，盡量發展生產力，令人人都能享受脫離私產束縛之自由及涵養智識文化之權利，方能漸進於無政府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階級（〈黨綱〉，頁 14；底線為筆者另加）

就此看來，階級論述相近於人的論述，認同人須滿足肉和靈雙重需要，只是相對地

更為強調人的基本生存——吃飯問題，也是凡人皆須面對的基本需求。瞿秋白這時聲明：《新青年》主張革命，不是因為格外喜歡革命、愛說激烈話（〈新宣言〉，頁 3）；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改造，不是追求「均產主義」，也絕非「中國式渾樸可笑的頭腦中之『窮人造反』」，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結論（〈黨綱〉，頁 13、14）。他的辯解恰反映出，正有人從吃飯問題、同情弱者、照顧窮人或均產主義的角度，看待（乃至於主張、支持，或駁斥）社會／共產主義⁶⁰。只是，如同下文所述，階級論述宣言追求人類的解放，照顧人人的需求，實際做法則是相繼圈出敵人，將他們排擠出「人人」的範圍，更將辨識敵我的判準放在獲得或掌握權力——無論是革命力量或個人權勢——與否的考量上。

一九二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後開始與俄國合作，並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中共黨員獲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十二月，《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出版，宣告將於次年開始恢復為月刊（事實上並未施行）。這時甫自俄國歸來的新任主編彭述之（1895-1983），作卷首〈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文，以階級論述涵蓋國民問題。文中表明：中國人民處於國際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下，應該聯合起來進行國民革命；這是「一切人民」的唯一出路⁶¹。不過，彭述之指出：國民革命係混合各階級的力量而成，必須有個「主要的進步的階級作中堅、作領導者」，才能引導革命、集中意識和力量、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軍閥；雖然根據理論，國民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中國卻只有受到壓迫最烈的工人階級能膺此重任（頁 13、14）。

彭述之的結論並不讓人意外。在此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透露出知識（階級理論）作為革命基礎的動搖。彭述之不僅主張國民革命須由工人階級領導，而且承認中國工人階級數量很少。他這時並未堅持各階級有其無法改變的根性，而是將工人階級、資產階級，還有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智識階級、各種苦力，甚至遊民無產階級，都視為國民革命陣營的成員，直指這些人的「利益」取向趨近於工人階級（頁 11）。更重要地，相對於瞿秋白先前宣稱新青年為勞動階級之羅針，彭

⁶⁰ 例如，左翼作家胡風（1902-1985）這時的短篇小說：張光人〔胡風〕：〈兩個分工會的代表〉（1923），梅志、張小風整理輯注：《胡風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頁10-17。

⁶¹ 彭述之：〈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頁1。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述之這時表示：智識階級沒有確定的經濟基礎，係依附著社會各種有經濟地位的階級而存在；即使智識階級之左派，也「必然要受工人階級之領導，在工人階級的意識底下」活動（頁 13）。那麼，少數的工人將如何領導革命？何人擁有真正的工人意識？誰有力量回答這些問題？凡此種種難題都將在日後出現，並且日益以訴諸政治力為解答。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部分中央監察委員提出「彈劾共產黨案」，未果。一九二五年三月，主張聯合俄國、容納共產黨的國民黨領袖孫文(1866-1925)去世，國民黨開始分裂。一九二五年四月，《新青年》再次改版，並以第一號為紀念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後改譯為列寧)過世一週年的「列甯號」。其中第一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列甯逝世一週〔年〕紀念宣言〉。這一宣言主張列甯主義是「資本帝國主義專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並聲稱：

中國的工人們，農人們和一切被壓迫民眾！你們要想脫離你們的重重壓迫與奴隸地位，只有起來努力了解列甯主義，實行列甯主義；因為只有列甯主義才是我們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才是消滅帝國主義和一切壓迫階級的唯一武器。⁶²

宣言最後以「全世界的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列甯主義最後的勝利萬歲」結束。在此，《新青年》所肯定的馬克思主義，轉以列甯這一現實中的政治人物為標誌，具體展現出其政治化程度已至另一高峰。

一九二六年三月，《新青年》改版第三期刊載了瞿秋白的〈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分析〉，重申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並嚴厲批評強烈要求清黨的國民黨右派，和反對藉由俄國之力推動革命的國家主義派。於本文而言，文中顯現出兩項重要的變化。一者，瞿秋白這時重新評價五四，並將五四歷史化，在指出五四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開端後，話鋒一轉，表示：

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他在政治上的成績，影響於多數民眾最大的，祇是「國貨」兩字，這一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和五四前後中國資產階級，確有

⁶²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列甯逝世一週〔年〕紀念宣言〉，《新青年》第 1 號（1925 年 4 月），頁 2。

一期的大發展的事實，便已經完全證明了。⁶³

瞿秋白承認，五四運動左傾而且共產主義化，孕育出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也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衝動。不過，他現在更為看重的是，從五四到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對抗日本棉紗廠的五卅慘案之間，六、七年的政治和文化意義（頁 23）。根據瞿秋白的說法，在這段期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開始明顯地分化；無產階級的改變在於：

從模糊籠統的聯合戰線進而至於明顯的自覺的，從資產階級「愛國主義」進而至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從資產階級聯美制日的希望進而至於聯世界無產階級的國民革命。（頁 24）

相對地，資產階級在發現必須犧牲私利時，開始反動、意圖消滅革命。藉由這般定位五四，瞿秋白模糊掉《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那段強調個人獨立、自由和平等的階段。

再者，瞿秋白這一文章在反擊所謂敵人時，採取了批判人格和誅心的策略。他指名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成員，「每況愈下」、「信口造謠」、「無知荒謬不學」、「有意混濛事實」，其言論「出於造謠中傷的用心」（頁 27、28）。也是自俄歸來的蔣光赤（1901-1931），更在同期所發文章中將反共產與吊膀子相提並論⁶⁴，其中用字遣詞與文氣全然不同於昔日主張說理的《新青年》。一九二六年七月，《新青年》出版第五號「世界革命號」後不曾再刊，也相形於正式結束十餘年來中國政治思想上眾聲喧嘩的時刻。

四、結語

十九世紀末的中西接觸，為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一個嶄新且深具威脅性的現代世界。如何理解這個世界並在其中「命自我作」，因此成為一個絕大的難題，雖然也是絕大的機會。《新青年》雜誌的出版與變動，記錄且體現知識分子在中外各種力量激盪的浪潮中，為自身和所在世界定性、定位的企求與努力。雜誌的內容多樣且

⁶³ 瞿秋白：〈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第 3 號（1926 年 3 月），頁 22。下文出自本文部分，將隨文注出頁碼。

⁶⁴ 蔣光赤：〈並非閒話〉，《新青年》第 3 號（1926 年 3 月），頁 96-101。

多面，展現出時人對於認識和改變自身處境與世界形勢時，內心的不安、好奇、熱情、憧憬、亟切、無奈、激動，乃至於憤怒和仇恨，也描繪出知識分子在行動上藉由修身為政治參與做準備，力求對抗社會多數之成見，以及作為革命指針的不同自我期許。凡此討論百年來業已引發許多的討論，本文另擇人之為「一」或為「多」的視角，重建雜誌中的政治語言，藉以再探五四思潮的複雜性及其歷史和現實意義。

綜合前列各節所述，《新青年》中所見人的理想及其對立面，可以分就「國民」、「人」和「階級」三項政治語言梳理。這些政治語言都從強調人之為「一」出發，力圖重建個人的尊嚴，並且在西方思想和經驗中，看見改變中國、致中國與世界入理想之域的方向和辦法。它們從主張個人克服內在的腐朽成分、樂觀地改造自己，經由籲求對抗外界的壓力、但求盡其在我，到鼓動打敗對立的敵人、創造理想的社會；它們也各以其方式，就個人、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等等不同範疇，闡釋人之自由和勞動的意義，以及與群體的連繫；其中阻礙個人發展的對立面，有不知不想者、有心作惡者，有雖無心卻為惡者，更有客觀演化出來的體制。凡此種種，都仍極為貼近今日個人的生活，值得再次閱讀。儘管如此，同樣需要留意的是，藉由鄂蘭和史柯拉所舉兩項主張——政治之為獨立的領域，與作為人與作為公民有其重要別異——看來，「國民」、「人」和「階級」三項政治論述雖然帶有解放個人的力道，蘊涵朝向重視人之為「多」開展的可能性，卻終究都回到人之為「一」的立場；階級論述最後甚至走向以強勢政治力高舉的一元化意識形態。

約而言之，國民論述中高一涵最初所討論的共和國民，最為接近鄂蘭關於共和政治意在肯定人之為「多」的解說，雖然鄂蘭重視憲政更多於人格的修養。不過，「國民」論述很快將問題從政治帶向文化的領域，主張個人的獨立自由是政治、文化和生活其他層面都應依循的原則；而高一涵的言論也迅即匯入這一趨向整全性思維的時代風潮中。究其思想理路，一者，「國民」論述從中國傳統個人修身、治國一氣呵成的立場出發，原即意涵主張個人道德修養和政治倫理並無二致的可能性。再者，在談論國民性的時代氛圍中，「國民」的意義很快從共和政治應有的國民，轉為現代國家中實際的國人，對於傳統文化的抨擊也迅即與國民性批判合流。影響所及，主張共和的聲音依然存在，但其聲勢已經明顯不敵對於國民性的關注；強調政治自由的國家論，也面臨以追求人民幸福為國家目的的挑戰。

文學革命主張中所見人的論述，直擊人之為一或為多的議題，看來明顯地主張

人之為多，追求人在既有制度下的解放和獨立發展，並肯定人在社會壓力下創新和堅持的能力，希望社會能夠開出容許特立獨行之人的空間。只是，人的論述同時也仍有以人為一的取向：堅持人道為一，堅持科學方法（特別是其中的實驗精神）為新時代價值判斷的標準，並認為個人被視為異端的行為，將能突破社會藩籬，帶來人類的共同進化。除此之外，相較於國民和階級論述，「人」的論述不談政治，甚至排斥政治；雖然知道社會的壓力不易克服，卻也只是強調個人不要被擊潰、要能容忍異見，而並未就制度面提出更有效的辦法，保障因持有不同主張而被多數壓迫和摒棄之個人。

階級論述明顯地從人的共同點出發，關切人類文化的存亡，強調科學的普世意義，尤其關切人的物質性生存，肯定多數——特別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多數——生存的重要性，並追求人人從物質性束縛中解放、盡情發展自我的未來。這一論述使菁英分子看見不同於自己的階級及其困境，甚至於指出有些人就是無法自行改變，必須另求改變世界的方式。至此，階級論述不談容忍或人人平等，而是將不同於自己的人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並且不斷分化人群，一心要用奪取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剷除敵人，使其無重生的可能。如果說階級論述以達致人人安居為目標，所提出的手段卻恰相反於其認同且保障人之生存和發展的初衷。尤有甚者，將科學權威與政治權威視之為一的做法，不僅戕害科學的發展，更使得知識場域成為政治鬥爭的一環，顛覆了原初以科學為行動基礎的信念，也否定了《新青年》雜誌早年堅持追求真理的目的。

最後仍須補充說明的是，本文從人之為一或為多的視角出發，借取鄂蘭和史柯拉所重視的問題，說明《新青年》中國民、人和階級這三種政治語言，在朝向人之為多這一方向發展上的限制。其中考慮不在否定《新青年》中的相關討論，或者批評提出這些論述的知識分子，而是期能藉由這一視角，展現重新閱讀和理解《新青年》雜誌的可能方向。鄂蘭和史柯拉的時代晚於《新青年》，她們的討論針對西方自由的實踐，回應西方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中的難局，但其中也彰顯出尊重與強化人之為「多」，是現代自由世界的重大難題，意味著造就與維護多元世界和多元之人的自由世界，實為艱鉅且無休止的挑戰。凡此說明不僅值得自由民主經驗的西方，與有待意圖採行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非西方世界多所留意，也為理解人類世界中政治為何物，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人之為一或多是人類社會無以迴避的議題；對於相關困難的理解和警覺性，

將有助於以更開放的眼光，看待和改善多元之人的存在環境。《新青年》中的討論並未使用鄂蘭和史柯拉的理論性語言，但已經明白揭示出人之為一或為多的多重視角，具體而微地透露出在現代世界中面對自己和面對世界的不同方向及其各自的難局，以及中國思想現代篇中，從建立共和到走向共產之間的曲折道路和弔詭關係。重新閱讀相關討論，或得促成個人更深入思索現代生活中的「我」與「世界」，乃至於共同書寫現代中國思想的未來章節。